

近代西方文献中的宁波

#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宁波社会(之一)

## ——《上海年鉴》中的宁波(六)

田力

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地动荡不安,对朝廷来说处在内忧外患之中:外有西方列强虎狼环伺,第二次鸦片战争烽烟再起;内有太平天国革命席卷东南半壁江山,农民起义风起云涌。即便是位于东南一隅的宁波,也常常能够感受到“天下未靖”的震撼。1853年3月,太平军莫都天京(今南京),其兵锋可直抵与之毗邻的浙江。1853年9月7日,属三合会支派的小刀会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,占领了上海县城。这两件事都对当时的宁波造成了极大的震荡,社会危机四伏,士绅百姓惶恐不安,变乱的种子也在萌芽滋长,而地方政府的社会管控能力却在不断减弱。正如当时在宁波任职的段光清所言“天下自此不安……人心正在思乱……宁波动辄聚众(闹事)”。

玛高温在1854年的《上海年鉴》中描绘了宁波城里的紧张局面:

大批的宁波人,他们原是在扬子江流域各大城市从事各种职业,因为受到无法进行交易的恐慌影响回到家乡,同时也将紧张的消息传达给自己的同乡。对于银元的需求使得它们的价值大大提高,其价格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富人们将财宝连同他们的家人藏起来或者送到乡下,而木匠们则忙着为街道制作栅栏,泥瓦匠在奋力填堵前门和出入通道。按照当局的指示,城里组织了巡逻队,尤其是对城门的守卫多加警惕。不过,并不是因为害怕叛乱者的袭击,而是为了防备当地强盗的劫掠。知县大人虽然沉迷于诗词,但却是一个称职的父母官,为了检查疏散的情况,他出了以下告示:“百姓毋需逃离,宁波是一座位于海边的城市,强盗不会到这里。如果你们担心遭受当地暴徒的袭击,那就先告知你们,本官已经安排了一系列的防护措施。”“自本公告颁布之日起,如仍有人目无法纪,胆敢逃匿乡间,本官会在各城门设置军事守卫,询查原因。”

阻止城内一些头面人物逃离的企图是徒劳的——没人把禁令当回事。知县大人发布的下一份告示更加成功些,因为受欢迎,他禁止从城内向外运输粮食。然而第二天,在米业公会的代表请愿和5000美元的担保之下,他确信这种限制是不合理的,于是授权大米自由贸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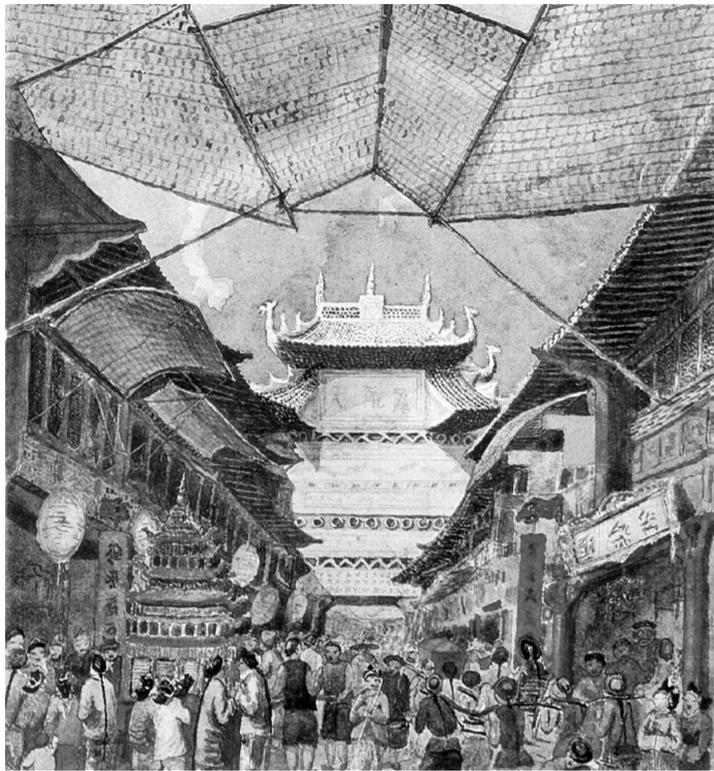
根据《上海年鉴》中的讲述,尽管形势危急,宁波的地方官却大多颓废无能,处置无方,政府的威信也在不断下降,士人、水手、农民等社会力量均可与之对抗:

现在发生的一件事情显示出士人的力量。在考场的墙上贴出公告,声称由于省会附近不安定的状况,将妨碍主考官在指定日期抵达宁波,并且推迟了文科学士学位候选人的考试(当指清代由各省学政所主持的“院试”,通过府试的童生均可参加,凡录取者被称为“生员”,俗称“秀才”——译者注)时间。消息一公布,从宁波府属五县来参加考试的童生们立即表达出强烈的不满。舟山的士人过来向知府请愿,要求免去该地区当年的赋税。知府对因延期所激起的义愤感到惊慌失措,于是请求来人暂留三天,直到他能从杭州得到进一步的指示为止。也恰好是在承诺的时间内,他能够给请愿者一个答复——也就是说——主考官正全速赶往宁波主持考试……

在甬江口的镇海约有40艘漕船,已经停泊了数日。它们原是准备开往扬子江口,在那里装载漕粮运至天津。知县多次催促船主放船出海,但终归徒劳无果,于是决定施以威吓。在农历新年,他将几个行为乖戾的水手拿下,并在衙门里鞭笞他们。然而第二天,他还没来得及将要惩罚整个船队的威胁付诸实施,就发现已经处于一群愤怒暴徒的围攻之下。在其成员遭受凌辱之后,水手们立即召集了一次会议,毫无争议地决定教训一下“县太爷”,群情激奋,所有人员立即着手执行决定。然而,那些受到鞭笞的水手在岸上的朋友提前行动,他们将县太爷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,但又为了救他性命,把他赶出县城,让他堂而皇之地逃回宁波。愤愤不平的水手们发现他们的猎物已经逃脱,便肆意在县衙、海关和其他官署公开破坏抢劫,直到知府从宁波赶来加以安抚,才使得他们平和下来。水手们获允在这个口岸继续“度假”。

我在舟山也目睹了类似的场景。当时,大批的商船被海盗所包围,而水师副将的大队战船也停泊在港。某天清晨,一艘小船载了几个人进港,海盗劫持了这些人的船只以后,把人给放了。其中的一些人因为中了火炮而奄奄一息,最终丧命。同伴们将这些可怜人焦黑的尸体拉到街上,愤怒的水手们聚集起来,冲进副将驻地,将他狠狠打了一顿,捣毁了所有的家具和部分营房。本来,由于这名军官所展现出的怯懦已使其声名狼藉,若上级知晓,则官位定不会不保,因此这些事情最后并没有向省里报告。

1853年9月,小刀会在上海发动起义后不久,宁波也爆发了双刀会起义,响应小刀会。双刀会原是属于反清



1844年的宁波街景。这是一幅水彩画,标题为《中国婚礼》,由克里(Edward H. Cree)绘制。克里是英国侵略军的随军医生,这幅宁波街景是他于1844年12月在宁波所绘,画面左侧有一顶宁波所特有的、新娘在迎亲中乘坐的朱金木雕万工花轿。

组织天地会的支派,发源于福建漳浦,后传入宁波。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,首领刘百川曾派副手张金山来宁波,“授以伪印旗帜及符布数万”,秘密集结各地双刀会成员,计划发动武装暴动,但事机泄露。正在家乡办团练的鄞县举人李厚建“变姓名,易衣冠,谒金山”,伪称自己“日思走上海投义军”,诱骗张金山至其家,设晚宴,趁酒酣时将张金山捆绑送官。张金山被清政府所杀。这个故事原是记载于中文地方志里,没想到新发现的1856年《上海年鉴》里也有讲述,但在内容上略有不同,“智擒贼首”的人不是李厚建,而变成了他的父亲李维铺。

自从上海陷落之后,宁波也有两次差点遭遇同样的命运。第一次是由一群来自舟山等地的冒险者,他们宣称是从小刀会头目那里获得授权,成立帮会,名为“双刀会”(Double Sword Society);向入会的成员提供一份与秘密会党通常所用一样的证书。七个主要的阴谋者来到宁波,以确保那些大胆的、鲁莽的人,尤其是出于任何理由对当局不满的人进行合作。对于这些阴谋者来说,不幸的是,他们被介绍给一名姓李的前任军官(指李维铺),他早已不耐烦再次赋闲在家,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讨好官府的机会,将上海来的密使出卖。他邀请这帮人参加宴会,并且在席上喝了威士忌(即指烈性酒的意思——译者注)。就如中国民谚所称“烈酒能够发现心中的情感”,或者说“酒后吐真言”(in vinum veritas),在获取了所有想要的信息之后,他召集了一些为此目的而雇来的随从,将客人全部捆绑起来,由其带到省城,直接交给巡抚。那些人在遭到严刑拷打从而供出有关上海叛军的情报之后,全部都被斩首。作为对李先生所做贡献的奖励,巡抚承诺他的举人儿子可以不参加考试就获得进士学位(the degree of L.L.D.),并且会向皇帝请旨,授予其荣誉称号。

而根据李氏后人为李维铺所立《曾大父笙南先生家传》中的记载,李维铺在得知张金山等人即将举事的消息后,对其子厚建说“事急矣,当以计擒之”,于是李厚建“变姓易服”,“往见金山,诱之城西,缚金山与其党”。李维铺“亲解省垣,皆置诸法,余众瓦解”。事后,朝廷“优奖盐课司提举,加运同衔”。可能这一说法更加符合历史真实。

社会动荡不宁,宁波人参军的意愿倒是很强烈。有些“聪明人”居然还从中发现了商机,利用外国人的名义,设计了一场骗局。玛高温在1856年的《上海年鉴》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:

有个宁波人原在上海谋生,因为城中的小刀会起义而丢了工作,被迫回到宁波依靠其“智慧”生活。他与一位朋友搭讪聊天,问道:“你听说没有?某某传教士正在组织一批乡勇保卫

宁波城,因此可以获得巨大的功劳。”一旦对方说不知道,他便接着解释整个计划的细节,然后告知这个计划是委托他来管理的。热心的听众很自然地就相信了这个故事,因为就像其他的城镇居民一样,凡是我们的(指传教士——译者注)的朋友所说的好事,他都认为是足以可信的。“现在”,那位狡猾的阴谋家说道,“我由于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在宁波,所以这里认识我的人并不多,我自己也不能很轻松地处理这件事;如果你能到乡里去招募新兵,由我来登记并组织他们,那么就任命你做我的副官。”结果在指定日期,有超过100名乡民被带到镇里登记,在此情况下,他们每个人都像往常一样,支付了一笔费用。因为在中国,事情通常是相反的,新兵得不到赏金,反倒是要为获得入伍的特权而花钱。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之后,这个骗子指使他那头脑简单的副官过几天就把这些人打发走,在此期间还不断招进新人;还说要在一个特定时间与所有的乡勇见面。到了约定的那一天,许多笨蛋带着他们的同伴前来加入传教士的民兵组织,但却发现找不到组织者了!那位副官和一些被骗的人前往某某传教士的住宅,在那里他们被告知,“这项事业的赞助人”此时还在舟山,另外就是,他们被骗了。乡勇们当然不信,又急忙跑去另一位传教士家中。这一次,对方终于让他们相信了整个交易的性质。这些可怜的家伙安静地回到田里干活,在类似的情况下,他们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农民都要幽默。



NINGBO ARCHIVES  
宁波档案

档案馆

责编 乐建中 美编 雷林燕  
2019年12月8日 星期日

投稿 E-mail: liz@cmb.com.cn